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六七四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創刊於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第六卷第四期

(總號第一三四期)

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

新力

短論

●●●●●●●●●●
學諸警人，救諸警人
促進人民生活的警覺性

攻勢政治在浙西前哨的再展開

「孫文主義」的方法論

克己復禮

從糧食管理得來的教訓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大公報

王耘莊

萬湜思

賀揚靈

後
費
版
端

定價每份六分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社址 浙江 方巖

南京圖書館藏

學諸賢人，救諸賢人

讓別人擔着去歌頌浙東前線的將士吧，在敵人這一次不愉快的流竄中，他們是表現了怎樣英勇的姿態！讓別人擔着去估計敵人所受的損失吧！我們只看到諸賢人民參加作戰這一幕，我們就驚喜萬分。諸賢人畢竟是諸賢人！在任何環境中，他們認為應該戰鬥的時候，他們就起來戰鬥。這一次人民參加作戰，犧牲很大，且因此更誘起敵軍對我同胞的殘暴，於是聽到埋怨的聲音，說諸賢人太蠢了，這時候和北伐的時候不同了，敵軍和當時軍閥的部隊相差又很大。蠢嗎？聽敵人像汪精衛，很知道敵人武器優於我們，所以做了大漢奸。蠢嗎？在敵人搶到家的時候，憑着最拙劣的武器，與之相拼，這是蠢嗎？只因爲勇氣非常，行爲也就非常；這種非常的行爲決不是蠢，是一切大事業的發動方。就全般抗戰局勢看起來，我們何嘗不是在以非常的勇氣與毅力在應付非常的環境！自衛的本能命令我們不論環境如何，必須挺起與敵人相搏，諸賢人就是個發揮自衛本能的好榜樣。戰鬥的諸賢人是可敬的，他們的心是一團火！他們的血是白流的嗎？他們和敵人一起倒下，他們給國軍以很大助力，他們給敵人一個深刻的印象；諸賢人是不可侮的！他們保全了已往的英名，全面的抗戰原委人民一起作戰；敵人這種流竄伎倆更需要人民自己來協力給予打擊。而諸賢人，他們台國軍給了敵人一次最好的教訓！

回頭來看他們的無家可歸，凍餓相迫的父母妻女！來看看諸賢劫後這許許多多難民！他們爲什麼受難？在抗戰中，受難的人這般苦楚一樣是爲全民族的自由與永存！何況戰鬥的諸賢人爲我們後方人民盡了保衛的最大的責任。現在他們的血輪未乾，屍首尙有未掩埋的，他們

的家族老幼又無宿無食，這樣悲壯的一幕而來的悽愴的一幕，不夠打動我們的心嗎？浙東的同胞們，救救受難的諸賢人，盡你們的力量來救助諸賢勇士們遺留的老小！你們想到受難的諸賢人的時候，也不妨想一想其他地方的災民，他們一樣需要救濟！前方的人民已經替我們担負了災難，我們應知道自己的責任！我們現在都須記着一個最重要的責任：自衛與互助。戰鬥的諸賢人是自衛的好榜樣，在互助上面，讓我們來競做好榜樣吧！（後覺）

促進人民生活的警覺性

不論做什麼事情，注意力的強弱決定其優劣成敗，敵兩方的爭鬥或競賽而論，警覺性與注意力強者總處於主動與控制的地位，所謂主動，原不過是處處能洞察分明，因而有充分的準備與把握而已。若是注意散漫，警覺性疲弱，就易受環境與對方的控制。這情形尤特著於間諜工作中，而間諜工作在目前戰爭中實在佔非常重要的地位。敵人利用漢奸，不能說沒有多少成功，我們反漢奸的工作，一向也極努力，但是要防止漢奸敵探以及澈底對付敵人一切陰謀，最基本的用力處還在促進全體人民生活上的警覺性。敵人的陰謀總是利用我們的弱點，如果我們確有一些弱點的話，警覺性的提高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最好的補救。此次敵人的流竄，雖然付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一般人民如有週密的準備，敵人損失必更慘重，也許無法乘虛而進。準備不能靠一時的激勵，必須平時注意謹慎，才有最週到的防範。我們和敵人接觸，戰場廣大，且不限於軍事，所以各方面都須靠人民的耳目和力量。人民的警覺性與注意力能提高，不但一切抗戰工作可因此獲得不少便利，且可以確保我們整個主動戰略之成功，促進人民生活的警覺性，這應該是當前民衆工作的重心。

攻勢政治在浙西前哨的再展開

賀揚 撰

天目以南各縣的政治現狀，大體上都在進步中。首先是對各種政治設施都有原則，能根據本省三年施政綱要中約規定，把握住中心，再配合地方的實際情形，有計劃，有步驟，有設施，有實際的進行着，從前那種頭痛腳腫脚腫的毛病，比較得少得多了。其次，各縣對於環境也能够相當的顧到，可以說並不忽視行政的一般性與特殊性，而能够做到兼籌並顧，雖然這種整個具體的計劃並不能十分完善，但只要從這種的趨向發展下去，完善的收穫是一定會有的。在另一方面說，適合於戰時要求的突擊性的工作，各縣也都能相當做到，在某種政治要求之下，大家都要集合全部的力量，集中注意於某種事件的應付，像最近救濟糧荒，構築工事，搶購特等米等，都能以突擊的姿態去做，且都採取到相當效果。

各縣的工作同志對於要求進步這一點，本是可喜的事實。有若干縣份似乎尚在保守狀態中，只做國防衛政治這一步，而大部份縣份則在求取進步，都感到各種工作做得不夠，自覺到主觀的力量不足應客觀的要求。且如何發展工作，如何解決困難，如何改進現狀，如何求取進步，這一種向上的精神，大部份的負責同志都有，尤以拿餘杭抗敵對敵鬥爭的進攻精神，很值得傳頌的。在抗敵方面他們感到對敵的侵略方法是多變性的，他們也以變來應變，在這邊求中，我們可以知道抗縣的對敵鬥爭是機動的，微妙的；在餘杭方面他們感到對敵的鬥爭工作必須先從近敵着手，因此他們的工作是挺進的，深入的，這一種新的趨向，在對敵鬥爭工作上說，都是必要的。有幾縣在重慶舊有的基礎，不斷的加以改革，有幾縣能節用人力物力，集中力量來做，這些都都有相當的成績。不過有若干縣份，有許多地方還是有些雜亂，不能有條理有規律的進展，政治認識也有些朦朧，對當前的問題不作許密的分析，保守敷衍的風氣仍然存在，缺乏革命進取的意向，這些情況仍可以看得到的。

再說到一般工作同志的工作興趣與業務精神，比較得還算好的，尤其是生活嚴肅與自我進修。我們所到過的各縣縣政府都可以看得得到，有幾縣在嚴格的實施中，像早操、升旗、討論會、小組會議，以及其他不賭博等等，尤以近敵偽控制點線相近的縣份，一般工作同志穿草鞋，打綁腿，跑路、爬山、餓肚子、生活相當的艱苦，而仍不放鬆工作，放棄責任，工作興趣與服務精神是高漲的，持久的。不過也還有少數縣份，多少還帶有一點衙門習氣或是官僚氣息，也還有私生活不檢點，遭受社會人士垢病的。這種要不得的現狀必須要改正過來的。

在敵我交界線內的老百姓，受工役勞役的負擔，真是非常之重，在敵我交界線外的老百姓，還受遭受受到那些民族敵類的騷擾欺詐與壓迫，真有人所想像不到的惡行，他們却還忍受，而他們的內心是極度痛恨的，這些老百姓看到我們的軍隊去打擊敵人，肅清敵類的時候，臉上都浮上勝利的笑容，又看到那痞棍的橫行不法，嗚呼天日的行爲，也在忍氣吞聲，把眼淚向肚子裏流。但是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念，爲了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爲了保衛家鄉，打擊敵人，任何工役夫征夫料，苦到什麼程度，都能够有極大的忍耐，與支持。在有些時候，我們的軍政人員爲了需求的急迫，甚至有對他們不好的地方，他們也還是忍耐，好像是說：「寬恕了自己人，就是間接的打擊了敵人」。在另有些時候；我們的公務員，爲了軍事的當差，也遭受說不出的痛苦，也都明白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能毫無怨言，忍辱負重，從大處着想，不計小計較。這一切的一切，說明了我們的軍政人員與老百姓的堅持性與忍耐性的頑強，可以當得這堅持長期抗戰的責任。

浙西一般公務員，都已養成了一種樸素精神與風氣，穿西裝皮鞋，着嗶嘰軍服的很少見到，大都是穿草綠色布軍服，打綁腿，着布鞋，甚至也有終日着草鞋的。從前那種公務員神氣活現的都市習氣，在浙西是很少看到的；有少數公務員在休假日也有着從前留下來西裝之類，可是

他們似乎怕見人面，似乎穿這些衣服是不應該的，這就是已養成一種樸素風氣的效果。我們到臨安的時候，看到一位由浙東來的西裝客，與粵處軍裝參挺的政治工作人員，大家都覺得驚異，好像感到這些人似乎不應該在前方工作；從前曾國藩有二句話：「用人不要有官氣，而要帶鄉氣」。這話是很正確的，自抗戰之後，一區各縣差不多都做到了。保安團羅團長與我說：「從前只有軍人能吃苦，穿草鞋，打綁腿，爬山跑路，忍飢耐渴，不算一會事，現在文人也做到了，這是抗戰之後，政治上的進步」。這話也是對的，抗戰之後，文人雖帶磨練得堅強起來了。可是還有缺點，要提出來說明的：第一、曾國藩說風俗之降污，幾乎一二人之所向，一區還有少數縣份的人員，奢侈曠博，還不注意這這一點，所以此後務須切實注意，身體力行的。第二、有許多工作人員在浙西是克苦樸素的，等到別地方去，就改作風了，這些人只能顧慮環境，不能克服環境，我們應該把這優良的習風傳播開去，使到處有這種樸素風氣。

在抗戰以前，有些縣份，時常可以見到黨政關係不甚密切，或是軍政關係不大合作，因而互相摩擦，互相抵銷，對工作效率的消耗是很大的，自抗戰之後，大敵當前，一切成見都拋棄了，黨政軍各方面的互諒與團結，都充分表現在各種工作上，精誠團結的精神不但是比前進步，甚至已進到了打成一片的地步。一區各縣，除一二縣的關係，還不確團結外，大部份都做到了互諒互助合作團結。像餘杭與杭縣，不但關係好，且對抗敵鬥爭的工作已做到共同合作殺敵致果的要求，敵分水富陽等縣，遇到地方上重大困難的問題，能够集合黨政雙方全體的力量，共謀應付，如最近的米荒問題，不但政府全力工作，黨部也動員全部力量來協助，這可說是十分難得的事情。

關於打擊敵人，粉碎敵線的工作，餘杭與富陽三縣都在積極的發展中，餘杭的工作同志，沒有一天不在敵人的邊線上來去，且深入敵人的據點，進行爭取民衆與策動偽軍反正的工作，都已有很好的成績表現。杭縣敵人的據點，最近增加到十七個之多，可說是星羅棋佈，但是抗縣的工作人員，仍是不斷的在敵人控制的點線內活躍，如水銀般的普遍深入，發展各種工作，且已日漸走上成功的道路。敵人在富陽，真是可憐得很，黑夜裏不敢出城一步，白天裏不敢出城三里，城裏的老百姓不到三百人，除了一個警察局外，偽縣政府到現在還無法成立起來，富陽方面還據抽空點，包圍點，使據點變為死點，失却其原有的效用，這也有相當的成績。總之，第一區前哨的三縣，在攻勢政治的號召下，正向利用面而包圍點的趨向做去，當然工作還做得很不够，尤其是富陽江北前線一帶，還須要積極的努力加強才是。

過去在餘杭太公堂一帶及附近的山嶽地帶，到處有鄉匪盜匪出沒，有時幾乎成爲匪窟，自抗戰到現在，這一帶土匪出沒的地方，却到很少了，這說明抗戰以前我們的行政工作，只注意到城市與平原，而忽略了山嶽，抗戰之後我們的政府機關退守到鄉村與山地來了，加強了面的統治與山嶽地帶行政工作的展開，因此從前被土匪擾攘不甯的山嶽，目前成了我們政治力量的基礎，經濟也比較前繁榮起來，這可說是全國政治上的新趨向，從此可以建立普遍的政政基礎。總之我國抗戰的勝利基礎建築在廣大的農村，這指示是很正確的。

第一區各縣有一個特殊的政治趨向，就是大家都注意到基層的發展，像後方昌化於潛分水桐廬等縣，對於健全鄉鎮保甲機構的工作，及加強黨的組織等工作，都很認真的注意，昌化分水於潛三縣的戶籍整理與區鄉鎮的機關整理，都比較得有成績，縣政府對鄉鎮保甲的運用也比較自由靈活，不過仍有少數縣份做得不够，甚至有縣政府與鄉鎮機關節節的現象，這是急待改進的。其次，與基層政治有密切關係的，就是鄉鎮交通的發展，做得最好的是分水，其次於潛，臨新各縣亦還好，鄉村電話佈置，造成了一個通訊網，在緊急的狀態中，可以在短時間內指揮鄉鎮的基層動員。關於鄉村電話的建設，希望各縣都能够加強與普遍，因為山嶽交通是不足及鄉的，爲應付某種緊急事變起見，專顧人力傳遞是不夠的。

財政爲一切庶政之母，這是誰都知道的，過去浙西各縣，對於財政是向不注意的，目從提出浙西的財政要自足自給的口號之後，一區各縣的財政基礎，都在用全力建立中，大部份都已有相當的成就；尤其是從前認爲游擊區縣份的財政是無辦法，這次看到餘杭杭縣的財政情形，不但不感到困難，而且將有餘裕，不但在自己政治力量控制區域內可以收稅，且在敵人區域內，老百姓也自願的向我們的政府繳稅，尤其是杭餘政府能在敵佔區收稅，並且有許多是自動投稅的，這一事實，一方面是表示我們政治工作的成功，同時另一方面也是表示我們老百姓不忘記祖國，不忘記政府。

不忘記抗敵，敵人所佔領的點線只是一個騙殼，一個表面，而實際上的靈魂——民心——仍是屬於我們的。

在各縣的行政計劃與經費預算上來看，今年的工作都比去年展開，預算數字上，各種行政事業經費，大都增加一倍或一倍半，都表示工作有進步，事業在發展，但因戰時的關係，上級機關與客觀要求的工作太多，有些平時行政上的工作，似乎是不必要的，可以緩做，可以不做的，也所在多有，因此有些縣份因為財政收入跟不上工作的要求，以致發現敷衍塞責的傾向，這種不得已的事實，各縣也多在設想改進中，但似乎還不夠積極，還須更大的努力。

暑期抗戰的歷程中，最怕是工作同志遭受了打擊而退縮、消極、動搖、苦悶，或是怕遭遇到意外的犧牲而逃避工作，挑卸責任。一區各縣有兩件事實是值得提出來抄明的：第一、臨安縣政府已撤入縣城了，過去的縣長把縣政府放在城外，託詞空襲，慎重文卷，實際上是自己怕死，沒有魄力；但老魯縣政府仍託空襲，躲避在外辦公，這似乎不大好，我們不能因空襲而把縣政府遷移，只能因空襲在鄉間找一個適當的地方設一個臨時辦公地，這在某種情況下，自是必要的。第二、桐廬縣縣長為禁賭而被傷兵毆傷，在我們的理想中，以為徐縣長受了這次挫折，一定有些消極，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徐縣長不但不消極、不安穩、不自談、不活動，而且積極的表示繼續奮鬥，堅持到底，勇氣且比從前增加，對於桐廬社會風紀之整飭，更堅持他的決心，屢次向我表示，對桐廬的賭風，我要再度全面掃蕩，這是很可喜的事情，是值得做一般人的榜樣的，我們對於這種堅持奮鬥的精神，不但寄與很大的同情，且當以全力來支持，本區功！

一區獲方各縣的工作，也有新的發展，以昌化來說，編練土槍隊，擔任自衛警戒的任務，並運用土槍隊整裝耕種，增加生產。編練婦女隊，發起做鞋子勞軍，和鼓勵婦女耕種。至於編查山地，確空地權，增加稅收，這是浙江的創舉，很可以提倡的。又如編訓賭徒逃兵，施行勞動服役，這一切的一切，都表現着一區的工作有創造性與建設性，走上了新的道路，建立了新的基礎。這一切工作都還在嘗試的過程中，要有新的成就與收穫，自然還須要繼續努力下去；另有若干縣份，也有幾部工作在開始中，在試驗中，這種自動性與創造性，可說是一區各縣政治的特點。

「幹部決定一切」，這句話自有道理，一區各縣對於幹部的培養，都還相當的注重，運用最好的要算餘杭，在餘杭，縣政府與自治幹部，大部份是由政工隊裏面產生出來的，政工隊已成了除抗行政幹部的預備隊，因此，餘杭的幹部人員是年青的，活潑的，富於戰鬥性的，適合對敵鬥爭要求的。昌化已有這一種趨向，其餘各縣亦在運用這種優良的方法。我們這次檢查各縣縣政府的幹部人員，全部健全的確有幾縣，政治認識與行動能力的水平，都相當的高強，不過在配備運用方面，此後還需要調整與加強，最可笑的，有一縣將軍法官去代理教育科長，雖然這是臨時性的調用，可是已變成行政界的笑話。我們認為「學以致用」、「人盡其才」，這是用人的原則，「學非所用」，「才不適用」，這是反常的現象，我們應該要十分注重改正的。

現代一切政治的成功與失敗，都是人的問題，所以用人行政是必須慎重注意的，中央對於人事行政最近十分注意，也就是這個道理。用人的條件，最應該注意的即是個人的生活風紀，無論縣長佐治人員，私人生活風紀不嚴肅，亂賭亂賭，隨意玩弄女人，這種私人行為，對於此社會風紀不良影響是十分重大的，因為公務人員是社會的領導者，一舉一動，無不為惡，老百姓都作為學習的榜樣，亦作為批評的資料。一區各縣的工作同志，不嫻不賭的生活示範精神，已相當的做到，但還有少數縣份，還是好賭好賭，這是要不得的，必須力求改正；有人以為這是私生活，公家不能管，可是私生活的腐化惡化，一定影響於公家事情的，一個人的精神是有限的，私生活腐化，把精神浪費殆盡了，那還有精力來辦公呢！所以事情的敗壞，都是以私生活不檢點為起點的，像南京偽組織裏的斯奮漢奸，那一個不是好賭好賭好玩女人的！因此，我希望一區各縣的工作同志，對於私人生活風紀，要發力警惕與改變。

我們巡視到分水的時候，發見一個特殊的政治方式，雖縣長治分水，已近九年了，一般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感情很融洽密切，好像家人父子一般的親切可愛，有許多事情，是用不到法律與命令的，只要幾句好話，事情就辦通了，縣長與人民之間，造成一種深厚的感情，所謂天理國法人情，這個話是不錯的，尤其是人情為政治中最重要的接合因素。分水的人民訟事很少，人民對政府極少不滿的情緒，可以說已做到了「政通人和」、「政簡刑輕」的地步了，這種政治無以名之，名之曰家長政治，好像還有幾分相象的。這種特殊的政治形態，已奠定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良好基礎，但再說到省政工大隊，這一支戰鬥的隊伍是始終在游擊區裏奮鬥的，一部份在湖北，一部份在京杭國道以東各縣，他們對敵工作，做得相當的積

極，有二件工作是較有成績的。第一、省政軍隊隊員大都打入敵人的據點，擊決的執行各種活動，並不是英雄主義式的，在許多軍事掩護中，藏在敵我交界線上，被敵人射傷傷亡，回來依舊工作，依舊面向着敵人，只怪自己應付得不好，不埋怨人，這種自甘與堅忍的精神，在這國家民族危險苦難的大時代中，所有前後方的同志都應該學習的。

敵縣長的最應注意與人的關係，即是所謂親民愛民的工作，親民的先決條件是縣長多下鄉多與鄉村父老接觸，或是縣府的幹部人員，多下鄉，多召開鄉鎮保民大會。這種親民工作，於省做得最好，沈縣長時常跑在鄉間的，我們希望縣長多接近老百姓，不希冀專在衙門辦公。以上與老百姓隔離。有人說救官在做事，如縣長不下鄉，根本無從知道老百姓痛苦之所在，要做的事在那裏，換言之，關在房子裏擬訂出來的工作計劃，無異閉門造車，一定不能適合人民的要求的。現在的縣長不但要親民，而且要近敵，海寧縣的縣長只知躲在偏安的角落裏，高唱政治進攻，不顧敵民，這是不行的，敵情餘兩縣長時常在敵人的點線上來去，督導對敵鬥爭的工作，這種近敵精神，很值得佩服；也有些縣長只是好動，卻不願靠近敵人，結果不但放棄了工作，還有高調放鬆了敵人，這些地方是要切實注意的。

一區專員對於各縣的領導，已建立好相當的基礎，他的辦法即是不斷的巡視各縣，深入敵區，對各縣環境與工作的認識，以及民衆的安撫，非常透徹，甚至有些問題，縣長還是他了解得明澈。本來一區的環境，無論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比二區複雜，但是因專員與縣長不斷的接觸，許多困難問題，時常可在接觸中謀解決，凡各種複雜問題，一天天簡單化，一天天解決了，一天天走上了配合與統一的軌道上去，這一個方針是正確的，一區將來一定可以達到目的。

在今天這種戰鬥環境裏，我們對於敵偽的認識是必須清楚的，即所謂「知彼」的工作，為一切事業準備的根據。一區，除抗對敵偽的內幕分析，認識得最清楚，以抗縣對敵偽的微妙關係，備認得最透徹，其餘各縣，對敵偽的認識還不夠，有的甚至沒有認識，只有一個籠統的概念，我們聽取各縣的報告，很少有在檢討本身工作之前，對當面的敵情與其工作之關係，先有一個一般的說明。這樣的情勢，將來一旦遭到了意外的變態，環境急速地變化時，自己的工作就無法應付，必定弄得手忙腳亂，甚至會失掉了統御力，因此，我們必須強調應變的準備，使一切工作都適合於應變的要求；要準備應變，最要緊在於一般工作人員對敵情的明白認識，且加強深度，使一切工作都出於敵認識上來打算，如此，不但不會工作落空，且可提高工作人員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奮鬥的精神，個人階級派別的利益打算，也可減少，所謂統一團結，最重要的方針，還是在加強對敵認識與對敵鬥爭的觀念上。

目前的民衆動員工作，似乎是逗留在一個消沉的階段，而昌化的動員工作却做得很起勁，這是不容易的，我們這一次檢閱土槍隊與婦女隊，共計差不多有三千人，在烈日之下站了三小時，精神毫無疲倦，尤其是二千個武裝婦女，戴草笠，穿草鞋，很整齊的排列在廣場中，她們在高呼，她們在歌唱，她們在行進，她們在戰鬥，處處表現不弱於男子，在浙西方面的婦女動員工作，當然要算以昌化為第一，尤其在這一年來各地的動員工作，因種種關係而停滯了，而昌化仍能繼續動員，尤其是婦女，這是很難得的。雖然關於政治與軍事的訓練都還感到不夠，目前只做到了一個開端，但能有這樣有方法的動員起來，且能合理的運用，這已可說有不少的收穫了。

關於機關整理與環境整理，大部分都還可以，比較以分水、於潛、昌化、桐廬、富陽好些，最差的是新登，機關內部的整理，非但不整齊，簡直有混亂，杭義後方辦事處內部的設備與環境的清淨，亦差而陋，內部也不大整理，這些對人民的觀感上是不好的，所以黃主席指示我們，機關整理、環境整理、機關人事整理，都要特別注意的，這就是說明我們對於政治工作，不但要注意精神，而且同時要注意形式，因為有時形式是會影響到精神，我們必須把精神與形式同樣的重視。

末了，我們在這次糧食恐慌中得到了個認識，分水到處多山，糧食本不夠自給，因鍾縣長有過去的教訓，在去年秋收發糧時，即打算這個問題，不斷向外搶購與軍米收購，到現在反而不十分恐慌；反之，桐廬是餘糧省份，不注意管理，任其屯積，結果到現在鬧糧食恐慌，比其他縣份反而厲害。從這點看來，古人教訓我們：有「有備無患」，這是不錯的，天下的任何事情，最怕是大意，是自己滿足，未來的禍患，往往就在大意與自滿中的觀念中造成了；反之，事業的成功也在經久或備與時時慮慮中造成的，不但糧食如此，一切問題都可以這樣看的。此後，一切工作事前要有準備，才不會發生意外，一切工作要能接受過去的教訓，才能成就未來的事業，才能有更大的成就。

「孫文主義」的方法論

萬涓思

孫文主義，總使我們極感佩服革命行動革命人格，偉大崇高非一般人所能攀即一樣，感覺他革命的理论，精深博大，亦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說中肯的。

一種嶄新的偉大理論之形成，大抵是中外古今思想的一「集大成」的結果。所謂集大成者，是說：攪拌開來，它作了個總樞紐。「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中國固有之思想者，有採擷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中國之革命）我們意謂 國父真正掘起了這樣艱鉅的工作。中外古今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革命家！學說中所有各方面的優良特質，可以說都辨明辨，吸納，熔合，從而創成了一個對於未來最有生命力，最富發展意義的新理論。這，味嚼着深廣的內含，我們一般地，稱爲「孫文主義」。

集大成是一件確難的事，「孫文主義」正表現着 國父在這工作上的深廣的修養，他不但博學，遠見，尤其主要的，還在平有「好方法」，他常常說：無論做什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

那麼，促使「孫文主義」成功的好方法又是怎樣的呢，據我所見，一言可以蔽之，即：他對於宇宙現象——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現象的解釋，了解，完全取歷史主義的方法，而他認識，研究宇宙現象——認識，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現象的方法，完全取科學的觀點。

對於宇宙現象的甚的認識，通常謂之「宇宙觀」，關於 國父的宇宙觀，德夫曾有人說是唯心論的，又有人說是唯物論的，不過，如淵博的 孫文主義 底內容所顯示者，我意謂決不是時下一批固執唯心論或庸俗唯物論的論客可藉用一個硬編織的名詞範圍淨盡的。

我們要明瞭他研究一切問題所採取的這正確的歷史主義的科學方法，有着怎樣的具體的內含，唯一的路，我意謂祇有從它的基本特點上去把握。

首先，全部「孫文主義」昭示：對於一切具體問題， 國父的研究方法，具有如下的基本特色，所以說他完全取科學的觀點：

一、以科學知識作準：分析無論什麼問題，都是科學知識「考其實」，建立無論什麼主張，都以科學知識爲基礎， 國父決不使自已墮入空想底迷霧中。他力倡「知難行易」之說，但他並不是一不可知論者，他在根本上意謂宇宙一切是可能認識的，他肯定科學知識有客觀的真實性，而且惟有由「科學之理則」，纔能求得真知。所以他在孫文學說中曾經說：「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有具以求其知，故知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持識，必後科學而來，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他在證明「知難行易」學說的時候，他在講「三民主義」每一細讀的時候，他在規劃革命方略的時候，乃至在他每一講演與給朋友的書牘中，無不以科學爲引證。

二、拿職諸事實做基礎：「孫文主義」，我意謂，對本國說，是「救國主義」，對世界說，可算是世界十二萬萬九千萬被壓迫者的救生主義。 國父當創成自己底主義時，時時以中國民族所經歷的事實爲思考的端緒，而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民族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一部份，因此，它，一般地說，也正思攷着全世界十二萬萬九千萬被壓迫人民所思考的。在不斷演化的宇宙間，如果沒有一成不變的絕對的真理，如早就人類所抱持的許多主義實，我們以能够爲最大多數人而思想，能够被大多數人所肯定者爲貴。則「孫文主義」便有着最卓越的意義。他底主義，不是意志底自由創造，他正面临着時間與空間的各種實際條件；他作爲一個功利主義的實行家作事理底深刻的探究，時時警覺自己：「事實決定解決問題的方法」。「大凡一種思想，不能說是好，祇看他是合我們用不合我們用。」（民族主義二講）因此他的學理不僅切

實易行，而且可以我們的實跡確證其實在性。國父根本上有着世界主義的真精神，可是他講民族主義，因為中國過去曾因世界主義的思想亡過國做過奴隸，而現在亦未具備講世界主義的條件。他講民族主義，主張恢復和光大國「粹」，同時「迎頭趕上」學歐美之所長，先求恢復民族地位，而後「還擊」對於世界負一大責任，即「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使世界「成一大同之治」。這種思想，完全是以弱國前人所受過的痛苦實情為起點的。他講民族主義，有鑒創的見解，他為了政治的統一與全能而創制「權」一能」，將「政權」「治權」分開；他突破治製的三種憲法論而主張五種憲法，這也是他考察了各國的政治實況，探討了各國的民族學理，對照了中國底社會情形（一般人之誤解平等自由以及軍閥割據，貪官汚吏，「豬仔議員」！等等）的結果。他講民生主義，首先主張平均地權，發展中國實業，同時要防止資本主義的流弊而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一方面復主張改善農工生活，增進工作效率，然後以國家財富，及實業餘利之分歸地方與中央政府者舉辦人民種種需要的，福利的事業。這種思想也完全是以當時中國的社會情形為準的。此外如作爲「孫文主義」哲學基礎的「知難行易」的學說，價值不僅在於以日常事實為證據，最重要的一點，還在於所創「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從而證明「知之更易行」，對於沈溺頹廢的中國人，對於人類社會的改革，具有豐富的革命性。

三、從困難矛盾求克服：困難令人省察，矛盾促使智辯，實際上，使我們由不完全的相對的真理漸漸接近絕對的真理的認識活動，祇是我們對具體問題許多難題和矛盾的不懈之征聖過程。所以在困難矛盾的衝擊中，往往約亮「真理」底火花。國父便是一位最能迎接困難與征難困難的思想家。他的革命學說，他底革命方略，一言以蔽之，是剖析了被壓迫民族痛苦，剖析了中國底困難，發掘壓迫民族及中國自身底求生慾與生存環境間的矛盾當重建起來的。譬如孫文學說之創作，國父在「自序」與「第一章」中，說得尤其明白：「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爲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闕矣，深矣

，其奈「知之非難，行之惟艱」何？予初聞去言也，爲之悚然若失，蓋「行之惟艱」一說，吾心奉信而無疑，以爲古人不我欺也。總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隱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果國艱鈞，幾如易也。予乃毅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一問題，以研求其究竟。幾少年日，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爲之豁然有得，欣然喜，知中國事向來之不報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向來者，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期中國之大事大有可爲矣，於是予以樞思所得之十事，以證明行之非難，而知之惟艱，以供學者之研究，而破世人之迷惑焉。」國父奔走國事三十幾年，推翻滿清創建共和，滿堂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及革命方略所規定的種種建設時，不料當時一般黨人竟謂這種主張理想太高，不能行於中國，國父乃深感知易行難之說實在是以毒志的當前大敵，於是他盡心盡力，準備「攻心」的工作，始而以知行合一之說作鬥爭的武器，繼而正而着知易行難的問題，潛心研求，鑽進了對黨底核心裏終於擊毀了它，而勝利地建立了自己底學說，所以這完全是不畏退地向當時一般黨員「攻心」，克服其體困難問題的結果。國父底這一種鬥爭精神，可以在他全部演說中找到，這同時也形成了整個「孫文主義」底革命精神。

四、由博納旁通取精深：我們眼見，國父遺教中包含着最豐富的各科知識，我們心裏，我們學說中熔合着最充實的各家學理。它廣人，而不蕪雜，它一貫，而不偏狹。論及中國史時，國父會說：「如能用古人，而不爲古，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奴，即載籍若似爲我調查，而使古人爲我書記，多多益善矣。」這不僅表白他對古人著作的看法，同時也可以當作對於世界上各家學說他取何種的態度，一般治學方法看。國父是將古今中外各大學說批判地接受了其中「肯定的要素」，並且將它們合理的「基本的核心」發揚了。他繼承了「禮運大同」的社會理想，他繼承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古代倫理學說，他繼承了「修齊治平」的政治哲理，他繼承了孟子「民貴君爲輕」的民權學說，他採納了西洋社會主義者民族自決的主張，他採納了盧梭的民約說，林肯的只有民治民享的主張，法國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他

採納了喬治亨利的土地稅制的主張，俾得參國社主義的節制資本的主張，樂國威廉氏以生存為歷史重心的學說，共產主義的理想，他採納了社會主義各黨團的策略，他採納了世界無階級的生活呼號，……；而同時更以新的形式與新的內容。即如「進化論」，這是國父在說明自己底理論時，常常引用，亦且是他歷史主義的科學治學方法上的一個特色。而他決不像一般淺識者所想像的達爾文、進化論……；祇是用以解釋人類來源，或用以研究生物學的。他研究達爾文，同時還研究古布希奄比多加利、地摩思里特、歐洲維新以後的史賓那沙、禮尼詩，以及拉巴刺、利里、拉瑪克、孟特爾、摩摩等學，他精研諸家學說，於是得出其中合理的核心，即是說：宇宙是一個能動的東西，它永遠在繼續向高級演化。他所把握的是這一點，他並不把動物社會的法則單純地轉用到人類社會上來，因為這是不可能，也不正確的。他嘗謂人類已經經過了物種進化的階段。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有他們自己固有的發展法則，（國父自己的說法，即：以民生為重心，趨向互助的發展法則。）和有機界生物學的發展法則是有分別了。國父自己曾將宇宙進化分為三時期：其一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為人類進化之時期，這是單就進化論的役用與充實舉的例，至於他對其他學理的啓發，亦莫不如此。

因為以科學作準心，所以不虛妄；因為用事實作基礎，所以不偏差；因為從難關求突破，所以成精銳；因為由廣博博精深，所以為恢弘。現在，我們再探討全部「孫文主義」，便可以見到國父對於一切具體問題的解釋，又具有如下的基本特色，所以說他完全取歷史主義的方法。

第一、他對於宇宙一切，都透入歷史底深處去了解，所以他認識各種現象都不是絕對分離，而是彼此依存，相輔為用的。儘管古今哲學家腦筋的一個哲學上的根本問題，便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問題，各種唯心論者宣謂一切存在都屬於精神的範疇，是精神的產物，各種機械唯物論者又宣謂存在唯一地都對地決定意識，物質產生精神像肝胆分泌膽汁；或者說物質與精神獨立存在而在觀念上將物質與精神並立着，這些無論他們說法怎麼不同，但一般地犯着同一類型的錯誤，就是將精神物質當作分離的兩個東西，歸根到底，便一道流入二元論的泥沼裏去。國父

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軍人精神教育」的講辭中，他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也。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在中國學者，亦恆言有體有用，何謂體，即物質，何謂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為體，屬於物質，其能言語動作者，即為用，由人之精神為之，二者相輔，不可分離」。他視精神物質為

一體。所以他意謂要給精神下精確定義，欲求精神物質之界限，是難能的。「簡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質者，即為精神可矣」，這在國父的本意，並非將統一體分裂為物質非物質兩種成分，指非物質者為精神。而祇是我們認識稱謂統一體諸特性時一般概念的分別罷了。這一觀點的正結性，現在已經被科學新知識一天天證實了。再，他看人類和其他動物也不是絕然離異的，「造成人類及動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為之也」。（孫文學說第一講）這種元子，一般學者稱為細胞，國父特名之為「中元」。更進一步，他看有機物與無機物，也不是各自孤立的，在「孫文學說」第四章中說：「前者之化學，有有機體與無機體之分，今則已無界限之可別，因化學之技術，已能使無機體變為有機體矣」。他從本質上把握了兩者之聯繫。有機體，甚至最高級的動物，在本質上，與無機物並無決絕的鴻溝。成為有機體基本特點的「原形質」，就今日的化學分析技術，已足以證明它的原質沒有一種不是很普遍的無機物：如，炭，氫，氧，氮，硫，鈣……等等。這樣的科學知識，是國父深信不疑的。再就三民主義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也是聯繫的整體，因為國父是把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互相關聯着觀察。又把中國各種問題視為互相關聯的。「民族主義者，打破種族上平等之階級也，民權主義者，打破政治上平等之階級也，若夫民生主義，則為打破社會上平等之階級」。總之，是要粉碎一族對他的壓迫，要粉碎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要粉碎富者對貧者的壓迫。換句話說就是要使人人能生存，而且生存得好好。社會發展，有其本身的基础，「民生主義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民生主義第二講）現在的核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有着不平等。所以，環繞着這核心，表現於世界上的生存的障礙，種種不平等：種族的，政治的，社會的，都是不可分割地聯結着的。如果要求生存有意義，國父意謂不能

不建立一個一貫的革命的思潮體系：三民主義，更不能不求其毫不偏重地澈底實現。所以說「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在「社會革命談」一書中又說：「今之反對社會革命者，謂中國之當急者乃政治問題，至社會問題則相去尚遠。蓋吾國生活程度低，資本家未嘗發見。歐美現象與吾相反，社會主義，日憂其捍格不入，奚言吾國？為此言者其淺見之徒，不足與言治也。諸君須知，歐美改良政治之時，其見解亦胡不同於吾人，當其時社會之清弊未生，彼以為政治良百事皆良，遂不注意於社會事業，及至社會事業敗壞，至於今日之歐美，則欲收拾之，而轉無從。」

！當美利堅國英自立，豈不於政治上躊躇滿志，乃未及百年而社會之苦痛以生，國利民福，以此犧牲者多。！吾國之革命，乃為國利民福革命，擁護國利民福者，實社會主義，故欲鞏固國利民福，不可不注意社會問題，夫美洲之不自由，更甚於專制國，蓋專制皇帝，且離愛民，雖專橫無算，猶不敢公然以壓抑平民為職志，若資本家即不然，資本家者，以壓迫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之痛苦，全無不負責任者也。

國父明白：中國推翻滿清，着手建設新中國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國利民福問題，鑒於歐美歷史，社會有其自己的發展法則，勢必至於造成資本家與平民的階級對立。因此要求防患於未然，便不能將三民主義分設看待。這是 國父的遠見，他不把世界看做互相對立，彼此孤立與沒有依存的對象和現象之偶然集合。而看做彼此聯繫的整體。他所說「不足與言治」的「淺見之徒」之所以不能見及這些，就是因為他們對於宇宙現象的認識方法，錯誤了，他們祇以其孤立的形體來看，離開了其周圍的現象，在作死板的觀察。 國父，不但在大的政治問題上如此觀察，就連日常極小的問題，都應用這種研究方法的。譬如「肥料問題」，「除了智利硝之外，海中各種甲殼動物的鱗質，和鑛山岩中的鈣質，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質，磷質和鈣質三種東西，再混合起來，更是一種很好的肥料，栽培其麥植物都很容易生長，生產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一畝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鎰穀，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收多二三倍。！！要用肥料，我們便要研究科學，用化學的方法來製造肥料，中國到處都有，像智利硝那種原料，中國老早便用來製火藥。！！；近來科學發達，發明了一種新方法，到處可以用電來造硝！！；硝料人

工硝與天然硝功用相同。！！；但是電又是用甚麼造成呢？普通價值極貴的電，都是用蒸氣力造成的，至於近來價錢便宜的電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來外國利用瀑布和河灘的水力的運動發電機，發生很大的電力，再用電力來製造人工硝。！！；所以他的主張利用中國西江，紅河，撫河，揚子江，黃河的偉大水力。這些科學知識的肯定，祇有在這種的認識方法上纔可能，即：不把自然界中任何部門任何現象，在其周圍條件之外脫離其周圍條件來觀察。否則，這便變為不可思議的了。相反地，他對於植物（穀）、肥料（智利硝、磷、鈣）、甲殼動物、鑛岩、電、蒸氣力、水力，等等都從它們和它們周圍現象之不可分割的聯結上，從它們對它們周圍現象的依存關係上，互相滲透關係上及互相推移或互相轉化的可能關係上去觀察，所以這些現象纔都可以解釋。

第二、他對於宇宙一切，都透入歷史底深處去了解，所以他觀察各種現象，不以它是固定的，不變的；而把它看做永遠在演變，在更新，在進化當中，自然中不斷地某些東西在生存，在發達起來，某些東西在淘汰，在破壞，在死滅滅。！夫進化者，自然之遺也。！孫文學說第四講） 國父是一時一刻也不忘記以進化論去解釋現象的。他相信這是整個自然的一個基本法則，此地所謂「進化論」，不單是達爾文學說之應用，重點點乃是說宇宙自然是能動的東西，裏面永遠在繼續變化的變化，根本上還有個特點，即把先簡單的低級的演變到以後複雜的高級的形象。！進化論者乃十九世紀後半期，達文氏之「物種由來」出現後，始大發明者也，由是乃知世界萬物皆由進化而成。！他信從達爾文的理論出發，接着對於自然進化更充實以自己底洞見：「吾作者（國父自稱）則以為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為人類進化之時期。元始之時，太極（此用以譯西名伊太也）動而生電子，電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質，物質聚而成地球，此世界進化之第一時期也。今太空諸大體多尚在此即進化之中。而物質之進化，以成地球為目的；吾人之地球，其進化幾何年代而成，不可得而知也。地球成後以至於今，按科學家據地質之變動而推算，已有二千萬年矣。由生元之始生而至於成人，則為第二期之進化，物種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本物質天擇之原則，經幾許優勝劣敗，生在淘汰，新陳代謝，千百萬年，而人類乃成。人類初出之時，亦與禽獸無異，

再經過幾萬年之進化，而始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遵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孫文學說第四講）在這裏，自然進化的幾個要點：

（一）國父全指示我們了：（一）元始之時，太極動而生電子，這是說宇宙最初的一刻起，從最基本的伊太起，都是動的，不是靜止的。因為能動所以能進化。（二）其一物自進行之時期，其二物種進行之時期，其三人類進行之時期，這三地進示物質自簡單而繁複，至於物種由微而顯，以至人類由對靈而文明，由獸性而人性，向高級的進化。（三）

新陳代謝，生存淘汰，這是說自然中永遠一邊在發生，一邊在消滅，也就這樣宇宙得能永遠更新。（四）今太空諸大體多尚在於物質進化之時期

中，而今日之人類猶未能悉行化除獸性，這是說宇宙的進化固然是向着上方，但不是沿直線的進化，也不能一刀殺清地截分時期，而是處於複雜錯綜的情況中。雖然，國父却絕不意謂歷史可能重復，進化容許徘徊。所以他堅信：人類今日雖互相作獸鬥，「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得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這一種觀察自然的歷史的態，是使「孫文主義」

成爲科學底要素。他講民族的造成，是血統，謀生的方法，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有共同性的進化的成果。他講國家組織，兩民族思想，從「進化」要求維持生存的一，國件最大的事，第一是保，第二是養

的。進行之上着計，所以他意謂國家制度是變史的，民權不是天生的。（見見極主義一、二、三講）甚至日常交際問題，穿衣問題，亦無不從進化的觀點研究：記得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一書中說「男人家胸脯上露毛毫許，有歐洲所在多有，在中國月未之前面」。他意謂這是中國人的「退化」，但這是站在原始動物學上說的話，國父則觀爲衣服文明的後果。宇宙萬物之中，祇有人類才有衣服。野蠻人類也祇有衣服，「原人類時代的人類，身上生毛得有許多毛，那些毛便是人類的天衣，後來人類文明進化，到了遊牧時代，曉得打魚獵獸，便拿獸皮做衣，有了獸皮來做衣，身上生長的毛漸漸失了功用，便逐漸脫落。人類文明愈進步，衣服愈完備，身上毛愈少，所以文明愈進步的人類，身上的毛便

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箇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

以進化論研究宇宙萬象，不但是歷史主義科學的方法，而且是功利主義的革命的方法。因為同瞭解自然，社會中新陳代謝生存淘汰的演變法則，所以就能够把握自然社會的發展的方向，永遠站於物種生發的那一面而前進，而不致於吊在時沙底尾巴上。國父的遠見，便由於這一點。他認爲「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從這一點出發，他相信人類最後一定將以「不講打的好道德，實世界主義的其精神」。

所以他講民族主義的時候，便防止重蹈歷史已經宣告必崩潰的帝國主義之覆轍，而以恢復民族地位，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列強銷滅帝國主義，促進世界大同爲奮鬥的方向。（見民族主義第四、六講）所以民國十幾年還有入做皇帝夢，而國父則還在革命之便主張民權政治，他意謂這一種趨勢是不可征服的。「從前入類的智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說起來，究竟爲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君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入類的智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時代便受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民權主義第一講），他並且更進一步講，一種革新的世界潮流，一經發軔，像長江黃河的水流，「無論怎樣樣都阻止不阻的，所以世界的潮流，山神權流和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還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破壞世間，很靈悍的軍隊衝動，都是終歸失敗」。

（同上）所以他講民生主義，便事先防範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因爲今日的歷史已經宣告了它底罪惡，宣告了它行將崩潰，而且事實上已經在崩潰了，我們不應該再跟在它後面。否則，他說「社會革命，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若不思慮預防，後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萬些，那時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嗎？」（民

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箇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

以進化論研究宇宙萬象，不但是歷史主義科學的方法，而且是功利主義的革命的方法。因為同瞭解自然，社會中新陳代謝生存淘汰的演變法則，所以就能够把握自然社會的發展的方向，永遠站於物種生發的那一面而前進，而不致於吊在時沙底尾巴上。國父的遠見，便由於這一點。他認爲「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從這一點出發，他相信人類最後一定將以「不講打的好道德，實世界主義的其精神」。

所以他講民族主義的時候，便防止重蹈歷史已經宣告必崩潰的帝國主義之覆轍，而以恢復民族地位，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列強銷滅帝國主義，促進世界大同爲奮鬥的方向。（見民族主義第四、六講）所以民國十幾年還有入做皇帝夢，而國父則還在革命之便主張民權政治，他意謂這一種趨勢是不可征服的。「從前入類的智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說起來，究竟爲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君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入類的智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時代便受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民權主義第一講），他並且更進一步講，一種革新的世界潮流，一經發軔，像長江黃河的水流，「無論怎樣樣都阻止不阻的，所以世界的潮流，山神權流和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還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破壞世間，很靈悍的軍隊衝動，都是終歸失敗」。

（同上）所以他講民生主義，便事先防範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因爲今日的歷史已經宣告了它底罪惡，宣告了它行將崩潰，而且事實上已經在崩潰了，我們不應該再跟在它後面。否則，他說「社會革命，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若不思慮預防，後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萬些，那時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嗎？」（民

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箇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

以進化論研究宇宙萬象，不但是歷史主義科學的方法，而且是功利主義的革命的方法。因為同瞭解自然，社會中新陳代謝生存淘汰的演變法則，所以就能够把握自然社會的發展的方向，永遠站於物種生發的那一面而前進，而不致於吊在時沙底尾巴上。國父的遠見，便由於這一點。他認爲「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從這一點出發，他相信人類最後一定將以「不講打的好道德，實世界主義的其精神」。

所以他講民族主義的時候，便防止重蹈歷史已經宣告必崩潰的帝國主義之覆轍，而以恢復民族地位，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列強銷滅帝國主義，促進世界大同爲奮鬥的方向。（見民族主義第四、六講）所以民國十幾年還有入做皇帝夢，而國父則還在革命之便主張民權政治，他意謂這一種趨勢是不可征服的。「從前入類的智識未開，賴有聖君賢相去引導，在那個時候，君權是很有用的，君權沒有發生以前，聖人以神道設教，去維持社會，在那個時候，神權也是很有用的。現在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跡，到了民權時代，就道理上說起來，究竟爲什麼反對君權一定要用君權呢？因爲近來文明很進步，入類的智識很發達，發生了大覺悟，好比我們在做小孩子時代便受父母提攜，但是到了成人謀生的時候，便不能依靠父母，必要自己去獨立。」（民權主義第一講），他並且更進一步講，一種革新的世界潮流，一經發軔，像長江黃河的水流，「無論怎樣樣都阻止不阻的，所以世界的潮流，山神權流和君權，由君權流到民權，現在流到了民權，便還有方法可以反抗，如果反抗潮流，就是有很大的力量破壞世間，很靈悍的軍隊衝動，都是終歸失敗」。

（同上）所以他講民生主義，便事先防範重蹈「資本主義」的覆轍，因爲今日的歷史已經宣告了它底罪惡，宣告了它行將崩潰，而且事實上已經在崩潰了，我們不應該再跟在它後面。否則，他說「社會革命，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若不思慮預防，後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萬些，那時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嗎？」（民

是很少。野蠻人和進化不久的人，身上的毛才是很多，拿中國人和歐洲人來比較，歐洲人身上的毛都是比中國人多，這箇原因就是歐洲人在天然進化的程度還不及中國人」。

以進化論研究宇宙萬象，不但是歷史主義科學的方法，而且是功利主義的革命的方法。因為同瞭解自然，社會中新陳代謝生存淘汰的演變法則，所以就能够把握自然社會的發展的方向，永遠站於物種生發的那一面而前進，而不致於吊在時沙底尾巴上。國父的遠見，便由於這一點。他認爲「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從這一點出發，他相信人類最後一定將以「不講打的好道德，實世界主義的其精神」。

國元年解臨時總統職後對同盟會會員講辭）他相信人與人爭，祇是「爭軀殼，爭飯盤」，要解決這種爭鬥，「必要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說「回復」是因為原始人類亦曾經過共產這種制度，但實際還是進化，「新共產時代」比起原始共產時代來，特具自有人類以來所積累下來的文明的較豐富的新條件。「到了新共產時代，大家都有麵包和飯吃，便不至於爭」。所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這樣的「民生主義能够實行，社會問題才可以解決」。（見民生主義第二講）

第三，他對於宇宙一切，都透入歷史的深腹去了解，所以他把自然一切都看做變動的，更進一步，他還說這一切變動的過程並非永遠是「由發基顯，由簡而繁」的漸緩的，向前的「深度底」連續進化，而且，在這基礎上，常常有着急劇的，顯著的，向旁的「寬度底」突然轉變。這一個觀點，使他深刻地明白自然社會中一定現象底界限以內的進化，演變為界限外的另一新現象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對於宇宙由物質進化進於物種進化更進於人類進化的完全過程，由伊太而電子而元素而物質而生元而動物與人的進化過程，（孫文學說第四講）都在這樣的觀點上被肯定，對於地球由氣體而為液體再固結為石頭，（民權主義第一講）對於電，尤，熱的「可互相變易」，（學說第四講）也都有在這樣的觀點上被肯定。倘若一定的質，帶有深度的變化，把變化視為數量上的增大，複雜或簡單，而不意謂深度的，數量上的變化常引起寬度的新質變化的話，那麼孫文「物種原始」上：「一切生存的物體，不是特殊的創造，而是若干少數物體的直系の子孫」的話，便不能成立，可是現在還有比這更高明的見解，國父深信它是科學知識。便是執着這樣的看法的。

因此，國父對於社會問題的思想亦特別深刻與正確，他在喚醒國民覺悟民族危機的時候，要大家注意作為「殖民地」的中國，（一）在人口上，正在感受壓迫，即正在變化；原來最多的中國的人口不在增加或正在減少，列強的人口却在飛躍增加。這一種好像毫不相干的人數的增變趨勢如果繼續到一定的限度，我們就會一旦亡國，依國父的說法即：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得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民族主義第一講）

「比如美國的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在一萬萬以上，再過百年，就有十萬萬以上，英德俄日的人口都是要增加好幾倍，由此推測到百年之後，我國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民族二講）從前滿洲是靠別種力量的優勢征服中國的，就人口說是少數征服多數，「因為他們祇有一百幾十萬人，和中國人口比較起來，數目太少」，經過了二百六十多年，漸漸地使中國人同化，同時他別種優勢的力量也漸漸為劣勢，所以一經我們革命，滿清帝國便倒產生了共和國。現在的中國人口，如果與列強比，正好像滿洲人比漢人一樣在走向危險底絕滅去。（二）除了人口增減的自然力壓迫，我們還受着更甚的人為力量的壓迫：「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中國近百年來，因為滿清的腐敗，在國際政治事件上，屢次失敗，這顯明地表現出來的是屢次割地，賠款，及由於其他屈辱條約所喪失的權益，而一方面是中國領土日吞日小，內政日益無辦法，這已經到了使列強準備瓜分中國的程度。那時候，如果各列強的力量不彼此牽制，如果中國不革命，沒有革命底勢力來轉變形勢，那麼中國一定早已吞併了。幸而不幸不是這樣，所以今日中國尚能掙扎，但我們「革命尚未成功」，還沒有從危險線上跳躍出去。至於經濟力的壓迫，據國父估計，就洋貨輸入，銀行，出入口貨物運費之增加，租界與割地之賦稅地租等項，特種營業，投機事業及其他等六項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此每年十二萬萬元之大損失，如無法挽救，以後祇有年年加多，斷沒有自然減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於國亡種滅而後已」。（民族主義第二講）這裏，人口壓迫，經濟壓迫，是比較掩蔽的，也是比較緩慢的。政治的壓迫是顯著的，急劇的，是人類國際間的鬥爭，它不外乎這種種力量的決鬥，而一般的都以政治武力作後盾。我們正受了這三重壓迫，中國人「萬古長存」的幻想，隨時有破滅的危險。所以他奔走國事凡四十年，畢生精力盡瘁於革命，革命者就是舊的流涕的急劇的驟然的破壞，新底力量的急劇的躍進的建設。「何謂革命之建設？革命之建設者，非常之建設也，亦速成之建設也。夫建設固有尋常者，即社會趨勢之自然，因勢利導而為之，此異乎革命之建設者也。革命有非常

之破壞，如帝統爲之斬斷，專制爲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壞，則不可無非常之建設」。《孫文學說第六章》非常之建設，就是說三民主義九種憲法及革命方略所規定的種種建設宏規之實行，中國是因了國父所領導的革命纔挽救了頹勢的。

因爲他看現象向新現象的轉變是由漸漸的深度的演變所引起的，所以，他意識事情的成功，革命的爆發，決不然偶然的傑作。「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孫文學說第八章）在這裏，他把事情的成否決定於兩種契機上：（一）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羣需要；（二）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這表示他觀察的無比的正確。他決不像唯心論者意謂大業的成功是英雄豪傑的自由創造。他也決不像機械論者意謂現象的發展單是量的向深度的增殖，祇要等待，任其自然，便「萬事大吉」，不是的人類社會發展，他意謂一方面要從社會條件的演變上去把握，一方面還要靠先知先覺志願導革命，纔能完成。但最後者是以前者爲基本的。所以他在論美法之革命與亞瑟頓，拿破崙時，說：「而不知一國之趨勢，爲羣衆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勢已成，則斷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轉移也」。

第四，他對於宇宙一切，都透入歷史底深處去了解，所以他把自然界看做是運動的，把社會現象看做是變動的。然而這變動的動力又是怎麼來的呢？關於自然現象變動的最根本的動力，在國父道教中我們雖然找不到究極的說明，（實際上，今日的科學知識也沒有達到這地步），但有一點很顯明，即：這一種動力不是外鏢的。生物之元子（細胞），他稱爲生元，他相信「生元有知」並不意謂另有造物主以「知」賦與「生元」，而是以「生元」「知」是合一的整體，有生元即有知。（此地知字不限於說知識知覺，那解爲一般的能，運動等等）。這一點，還有許多極聰明的科學家都很糊塗，他們證明以太是動的，但他們設想「上帝的手指撥動了那以太」。一般的說，照目前所有的科學知識，向「物體運動的最初的動力是那裏來的」那樣的問題是傻氣的。我們想一種：普通說物體的構成曰分子曰原子曰電子。物體分析到分子已經是怎樣大的顯微鏡都看不着了。最複雜的分子如澱粉，它最大的分子直徑祇一千萬分之一吋左右，又譬如：如果將一滴水放大到地球那樣的尺寸，

則這滴水裏的分子，也不過如同橘子一般大的模樣。分子又是原子構成的，目前發現的宇宙間原子共九十二種，最簡單最小的是氦原子（He），最複雜同時也最大的是鈾原子（U）。（複雜的並不一定是最大的。）鈾原子的直徑是一萬萬分之一吋，氦原子的直徑則祇有二萬五千萬分之一吋。原子現在又知道是電子組成的。電子有負電子與質子（即正電子）。電子（一般係指負電子）較輕而較大，直徑爲二十五萬萬萬分之一吋，質子較重而更小，約當負電子直徑一千八百分之一吋，即直徑祇有四萬五千萬萬萬分之一吋。是這樣小，幾乎是難以想像小的質子。據湯姆生（J. J. Thomson）（「電子學說」的建立者）的學生羅斯稱志（Ernest Rutherford）的實驗報告，却有着高速度運動，大概每秒鐘達一萬里。據說負電子比這更要快。在這樣的場合，所以有許多科學家哲學家相信電子怕也還是無窮盡的，而且意爲運動便是物體存在的形式，物體也便表示運動的存在。物體運動是合一體，沒有運動的物體與沒有物體的運動一樣不能想像。國父大致就取這樣的觀點，所以他說「元始之時，太極（以太）動而生電子」，所以他說「始初太陽和氣體都在空中，成一團星雲，到太陽收縮的時候，分開許多氣體，日久凝結成液體，再由液體團結成石頭」（民權一講）而成地球。物體就有着自己的運動。至於這自己運動怎樣形成的問題，現在的科學似乎也還缺乏完滿的答覆，有的，祇是說：因爲分子的不平衡而互相碰撞，或者說：原子運動的構成由於它內部有負電子與正電子。不過像這樣的問題，國父似乎並沒有去想它。他總是就比較可靠的科學知識立論的。

關於社會變動的動力，國父則說得很明白，「就是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民生一講）民生是什麼呢？「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民生一講）總而言之，是人類的生存向榮。古今人類，第一件事：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要能够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大大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够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存

便要奮鬥」。(民權第一講)奮鬥促使進步。這是說，人類一開始，爲了生存，便和其他動物如毒蛇猛獸起了衝突，發生了「問題」，爲要解決這問題，便要奮鬥，同時也促成了自己的進步。人類在那個時候，是「大家同心協力」，祇求「殺完毒蛇猛獸」謀本身的生存的。但是人類戰勝了毒蛇猛獸，生存還是有着問題，因爲人類的生存，不但與其他動物發生衝突，並且受天災的迫害，到這時候天災是顯得特別嚴重了。所以還是奮鬥，要想辦法避災害，在這當中，爲生存的奮鬥，更發展了人類的智慧，社會也更顯得複雜了。等到「人同天爭」大致上天災不能爲害的時候，人類的生存問題是否解決了呢？還是沒有，因爲人類的生存，不但與「毒蛇猛獸」發生衝突，不但與天災發生衝突，而且「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人類爲了生存自己彼此間亦發生衝突。在人同天爭的時代，已經有「聰明的」利用「神道設教」，躍上了優越地位，到這時候，人類彼此間的生存衝突更顯得厲害了。差不多人類時間的全部都是在編譯解決生存衝突上。這樣人類社會常常「打破舊制度，發生新制度，社會上因爲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變化」。(民生主義第一講)。

這樣，是非常明白的了：人類因爲努力，奮鬥而進化，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生存」。(民生主義第一講)要解決生存利益的衝突，要生存更向上，他引用歐美學者之言，分生存程度爲三級：曰需要程度，曰安適程度，曰繁華程度。人類不幸在這些階段上彼此常有利害衝突，爲要不斷地生存，便需要不斷地努力求衝突的解決，這樣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

馬克思主義說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中的歷史發展的動力，「孫文主義」說民生是人類社會中歷史發展的動力。從以上所論可以看出兩者的不同點祇是在這裏：(一)馬克思的觀點偏重於人類社會的一特定階段，即階級社會。國父的觀點却擴大在人類社會底全過程上。(二)馬克思的觀點注重於人類求生存發生衝突而鬥爭的事實，國父的觀點則從衝突鬥爭的事實推論到衝突鬥爭的動因。還是爲了民生。(三)馬克思著眼於階級社會，所以強調「無黨性」的鬥爭，國父著眼於人類社會全體，立論便比較平和，他強調鬥爭既是爲解決衝突，自然應該強調「衝突的解決」這一點，而人類解決衝突的途徑，就人類歷大的歷史

看，鬥爭不是唯一的，在目前解決社會問題要求徹底，固然常常須要鬥爭，但是在將來社會上，也許鬥爭將變爲次要。所以他關於人類解決生存衝突的努力，一般的都說「奮鬥」。奮鬥是爲「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奮鬥是爲社會上大多數生存利益的調和，是爲社會上大多數生存衝突的解除。他認爲「奮鬥」：革命，不安協的革命是重要的。譬如「政體不好」，「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見民報紀念節講辭：中國前途問題)對於「專制餘毒」他所以堅決主張「澈底淨盡」。(中國之革命)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明「國民黨宣言」時，鑒於過去失敗的經驗，更着重指示：「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担负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澈底的革命，務要把軍閥推翻，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於對內的責任，至於對外的責任，又要反抗帝國侵略主義。將全世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來解放，我們！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妥協，以後應當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銷，並且知道妥協是我們做澈底革命的大錯」。他到了將逝世的一刹那，唯一的憂慮是：惟恐同志被敵人「標化」。(見黃昌毅講述 國父逝世情形)實際上是異常明顯的，「孫文學說」便是革命學說，「三民主義」便是革命主義，「建國方略」便是革命方略，國父自己常說：「我一生是一個革命黨」。這便說明他對於革命即不安協的鬥爭的重視。不過另一方面，他也並不漠視「和平手段」對於改進社會的有用性。在將來階級消滅的社會進化將以什麼爲動力，姑且不論，就是在目前社會上，這種逐漸的，和平的，都局的，人類生存衝突底調和，對於社會發展，不能完全否認其作用，例如 國父指出的：「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分配之社會化(如合作組織)等是。(見民生主義第一講)我想，關於這些事實，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也未必否認的。

國父對於自然與社會諸現象的了解，國父研究自然與社會諸現象的方法，據筆者所見，具有以上所說的這些基本特色。在這裏，很明顯地表現着：他與一般非心論者及機械唯物論者對宇宙萬象所採取的觀點，有着根本上的區別。

克己復禮

王耘莊

孔子應對弟子的話，往往所問相同，而所答各異。蓋緣孔子與諸弟子共處日久，深知他們的長短所在，各不相同，為扶偏救蔽，針對他們的缺點起見，說法就不能不兩樣。然在孔子，其遺原是一貫的，這種說法的不同，不過表示他說話時的着重點不同罷了。在弟子方面，則待孔子日久，自然也能心知其意，知道孔子這樣和他說，只是曉示他最應當警惕最應當用功的地方在那裏，決不會以偏概全，以為道盡在於是的。

然而孔子對顏淵說話却有些不同，蓋顏淵為孔門弟子中得道最深造詣最高的，已幾乎聖矣，所以對顏淵說話，往往從全體上着眼，從根本上着眼。

認清了這些，然後我們再來看孔子回答顏淵問仁的這一句話：克己復禮。（論語顏淵）

方苞說：「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原過）所謂「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便是不能克己，克己，猶言約身，約如約束之約（注）。「自知而不能勝其欲」，不可以說是不能克己，我們應當記清楚

，孔子這句話是對顏淵說的。

人世間有許多事情，原是無善無不義的（即非道德的），如飲食起居，男女大欲之類，然而不能約束，便將成過。

有許多事情，依理而論，原是對的，就當時的情境論，也確有令人氣憤而不得不然之勢，然而若是順其氣而行，便將成過。鄉人涉訟，往往有「賭氣不賠財」之說，所以不能忍氣者，以理在我方也，然而若順其氣而行，則就利害而論，固往往會弄得兩敗俱傷，即就理而論，也常不免因持之太過，轉移到對方去的。薛敬軒謂「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誠哉悟道之言！

心情不正當的時候，是克己最難的時候，呂心吾說：「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此是省察大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所謂檢點，便是克己工夫。

情緒激動過甚的時候，也是克己最難的時候，所以王陽明有「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毅然能忍耐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忿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的話。

處逆境的時候，也是克己最難的時候，所以以子路之賢，夫子在陳絕糧而有慍色（論語衛靈公）；古人修己，若東過危難而不亂，便是此意。劉沖倩有一譬喻很好，他說：「人當逆境時，如犯痢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却較輕微。」

有外物引誘時，也是克己最難的時候，然而與外物隔絕，却不是存養之道，因為這樣一來，不惟無益於身，且將更抵當不住外物的引誘。所以呂滄野以為「要於繁華波濤中學，敏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能克己便能復禮；克己工夫，要在日常生活上留意，要在氣盛時留意，要在心情不正當時留意，要在情緒激動過甚時留意，要在處逆境時留意，要在有外物引誘時留意。那末克己工夫要在什麼事情上做起頭呢？要從細微末節上做起頭，當時「顏淵問仁」，孔子回答他「克己復禮」以後，顏淵又「請問其目」，孔子的回答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注：參考劉寶楠論語正義。

從糧食管理得來的教訓

(轉載)

糧食管理的成績，最近漸有表現。就陪都說，米源充暢，而市價穩跌，社會上無形的憂慮，因而一掃。這一點初步的成功，在抗戰建國全局上，其意義則十分重大。

中國人民一向習慣於無組織的自由，最好一點也不受政府干涉。而官吏呢？對於統制經濟，管理民生，又本無經驗。所以政府的設施，往往成績不如預期，甚或結果相反。因此之故，一部份社會產生一種謬誤的結論，說是統制越不好。這種思想，特別在還危急存亡的戰時，非常有害。因為欲貫徹抗戰，求取勝利，必需統制經濟，管理民生，若這一點做不到，就斷不能愈戰愈強，就不能夠無限的長期抗戰。那麼，中國民族的命運，就不能說一定沒有危險。所以這一點是中國興亡的歧路，抗戰成敗的關鍵。問題這樣重大，而那感那穆分歧，然而要打破社會謬誤的思想，只有靠成績，不能靠命令。就是說，必須統制管理得好，才能使人民心悅誠服，才能建樹起來政治的大信，使一切統治管理的事業，更隨時進步，毫無障礙。

最近的糧食管理，實行並不久，可以說才在創始的初步，然而現在業已有了確實的成效。我們對這一點，認為是極可寶貴的教訓，值得特別表揚，最近的情形，無疑的證明了一幾點：第一、請看世界交戰國家，對於統制經濟，都用了最後手段，就是對於生產分配，都嚴格管理，強制干涉。我們的敵人，早就如此。但中國經過三年大戰，並運用過最後手段，並且距離還甚遠。現在的糧食管理，也不過是略加初步的管理，其目的只在管理着使糧食自由流通，這在各國，也是平時當然的政治，而在中國，則大戰三年後，才着手試辦。這也證明中國得大獨厚，應付長期戰爭的餘裕尚大！反過來說，如此天然豐厚的國家，假若內官吏管理不善，和人民不服從管理，以致經濟失敗，抗戰不成，那麼，這一代的中國人，可說是太沒出息！在人類歷史中，要永垂成笑柄，還不僅是要貪受亡國奴隸之禍了！因此，我們切囑全國官吏人民，必須更加強合作，切實努力。不但糧食管理，要更求合理與穩定，其他一切經濟部門的事業，都必須使之表現成績，愈戰愈強，這必然可能，只問是否認真努力。第二、中國本來沒有經過這樣大難，當然沒有管理戰時經濟的經驗，這是絲毫不可諱言的。何況戰爭這樣久，封鎖這樣烈經濟變動當然

大，統制管理當然難。然而有一絕對真理，就是隨時隨地，當然有辦法，問題只是在是否得到辦法。所以政府每一政令，事前貴詳細研究，事後貴不吝改正。凡事詳察實情，博采民意，若發現不適，隨時加以改正。這並無礙於大信，而且正是宣揚大信，因為這是證明政府實在想辦好。這種誠意的貫徹，就是大信的宣揚。在政府這是政府的大信之下，而若一部分人民，尚不竭誠合作，甚或加以阻撓，那當然用法令強制，不加姑息。譬如糧食問題，從去年就開始研究，而成績不佳，現在認真去做，就有了相當辦法。這就是證明政府認真努力的事業，是一定有辦法的！今後抗戰延長，客觀情勢，不斷變更，所以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而卻必能靠誠意的努力，求得隨時的辦法。在政府誠信感格之下，一般人民也決不會反對，事實上可以做到永遠不需用法令強制，而自然通行。這是從最近糧食問題得到的信念，希望政府更善盡其責！第三、一切問題之解決在於人，務求更動員人才，練成有力的幹部，執行管理經濟各部門的工作。這兩年，常有經濟總動員的呼聲，而政府又有經濟作戰部的籌議，這實在都是急切需要的。我們深深體會，抗戰不是專靠軍隊，而尤其靠有力的經濟大軍。漢高的功臣，蕭何與韓信並重，或者蕭何更重。我們不期待靠一個蕭何解決今天的戰時經濟，但必須期待動員大眾的幹部，使成爲一羣蕭何。就最近的糧食問題而論，一大羣熱心的公務員，殫智竭慮，勞瘁奔走，這才得到初步功效。我們對這批公務員，十分敬重，同時更願鼓勵他們，以及其他部門的公務員：凡努力經濟工作的人，實際上同在前戰場殺敵，一樣辛苦，一樣寶貴，諸君實際上就是戰士！凡是做得好的，國民衆同前線將士一樣的加以崇敬。同時，諸君每一個人，當其執行職務之時，都是國家的代表！這就是說：諸君每一個人的工作好不好，品格端不端，都直接使得到國家抗建入政受到或好或壞的影響。那麼，就可以說，諸君的肩膊上，都負着天下興亡的一部分責任！所以我們熱誠希望諸君，要一致的前行將士一樣的嚴肅緊張，今後更殫智竭慮的去研究。至公至正的去做！那麼，我們相信一般人民心悅誠服之不暇，多數人不肯阻撓，少數人不敢阻撓，然中國的戰時經濟，一定可以支持無限的長期，而轉弱爲強的敵人，更其既滅而長，而抗戰成功可以有確實把握了。——（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大公報社評）